

中国哲学史纲

李维武 编著

巴蜀书社

一九八八年 成都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张光明

中国哲学史纲

李维武 编著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8.875 字数 350 千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90 册

ISBN7-80523-018-8/B·3

定价：4.30 元

序

萧 薏 父

《中国哲学史纲》一书，系李维武同志近年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汲取了现有多种教材的优点和一些科研新成果而编写成的。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自学哲学及哲学史的要求，适应师专以上院校有关专业进行教学的需要，故在内容安排、体系结构和表述方法上，都力求简明扼要，举纲张目，去芜存菁，旨在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重要范畴衍变和主流学派代表勾画出来，让读者有一个总体轮廓的了解。书名《史纲》，立意在此。

我高兴地读到这本《史纲》的书稿，感到它作为一本中国哲学史的简明教程和自学

参考书，既认真消化已有成果，又勇于开拓和创新；既注意贯通全史的知识广度，也不忽视加深必要的理论分析，是一本卓有特色的好的入门书。

这本《史纲》，就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逻辑构架、以及一些基本评断，大体采自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九校合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但经过作者的熔裁取舍，文字浓缩，章节改编，论点突出，有不少发展。诸如对原始社会哲学思维萌芽的概说，对柳宗元、刘禹锡、张载、朱熹思想的历史作用的分析，对王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及泰州学派产生的必然性的论述等，都有所损益，别出新意；特别是第六编，新增补了《五四运动以后中西哲学的融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两章，把“五四”时期的哲学论争和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思想，首次纳入中国哲学史体系而予以述评；对“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也首次作为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结果而作了概述。这对于以往中国哲学通史体系（大都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限而截止于“五四”之前），是一个饶有新意的延展和突破。“五四”以后的中国哲学运动，在中西文化思潮的汇合激荡中发展，本有丰富内容，长期以来由于“左”道乱真而被抹煞，由于缺乏系统研究而被简化。事实上，中西哲学开始融合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哲学的诸形态，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所引起的中国哲学革命的新纪元，都产生并成熟于这一时期。《史纲》所增补的两章，占了全书篇幅七分之一，尽管网罗未周，纓汲尚浅，但毕竟拓荒开路，引发人们进一步注意和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而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诸形态的深入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未来道路的摸索，乃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迫切的时代课题。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哲学又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当前，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

临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评判和选择,反映了在全面改革中必然引起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震荡和重建。文化研究热潮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而所谓传统文化,有待层次分析。表层结构的物质文化,因时而变;中层结构的制度文化,也较易改革;而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人们在历史实践中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模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等,一旦形成就具有惰性。哲学,作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理论结晶,更有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稳固性。当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就必然涉及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和评判。《史纲》的作者,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写作,自然注意到历史上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依存的文化土壤,而各种哲学又反过来渗透进文化诸领域并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本《史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灵魂,采取了

慎重的分析态度,既通观全过程以考察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又按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辨别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我想,这种分析态度对于读者了解中国哲学遗产的全貌,探讨当前文化问题的论争,自觉树立文化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发展着的学科,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僵化体系,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扩大和加深,研究方法的日益改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建设,正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在多样化形态中去发展。哲学史的研究,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趋博;或纯化为哲学认识史,或泛化为哲学文化史;或宏观,或微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并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的反复加深,才可能不断提高科学水平。志在求真的学术研究,应当勇于坚持“独得之见”,乐于听取“相反之论”,善于在学术观点的对立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自觉地促进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

百虑”中学术的繁荣和真理的发展。黄宗羲也懂得：“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维武同志勤奋好学，博涉不倦，这本《中国哲学史纲》的编写，是他投身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科研工作的起步成果，但已斐然成章，颇有创获。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不畏崎岖，始能攀峰。晴空鹤唳，企望未来。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十月

导 言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积留了丰富宝贵的哲学文化遗产，融成了绚丽多彩的哲学历史画卷。）

伴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视反思前人哲学认识成果的优良传统。从先秦至近代，总结性的学术思想史论，代有名篇，未曾间断，如先秦《庄子·天下篇》、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唐代宗密《华严原人论》、宋代朱熹《伊洛渊源录》、明清之际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法对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了总结，为“五四”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专门化和科学化作了历史准备。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式启蒙，对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冲击，促进了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及哲学史观的传播，从而引起了中国哲学史观的变革，使中国哲学史从学术思想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五四运动前夕出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首次对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目的、分期作了厘定，破除了古代学术史论中对孔丘与儒家经典的迷信，是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专

著。以后，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钱穆等又沿此方向，更深入拓展，写出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论著。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抗日战争前夕出版的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写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此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思想通史与专史日益增多，郭沫若《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论著相继问世，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克服了“左”的错误路线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长期影响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一大批有质量、有影响的论著。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中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成果的领域。但总的来说，这种研究在史实文献的考订、思想脉络的清理、科学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中国哲学史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还需要多方探索，不断创新。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以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哲学智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同时又遵循着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首先体现在中国哲学认识发生、发展的根据上。这种根据包括哲学发展的社

会基础与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两个方面。

一方面，任何哲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与当时的科学、宗教、社会心理密切联系。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反映。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点，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反映到哲学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与宗法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封建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建立与稳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与近代社会的“难产”，都对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哲学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中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又如，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兴起了早期启蒙思潮，涌现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对宋明道学进行批判，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进入自我批判时期的反映。再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更是风雷激荡，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分化，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中经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论争，至三、四十年代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建立起各种哲学体系；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的蓬勃兴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这些哲学思潮的起伏与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反映，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反应。

(另一方面) 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矛盾是哲学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哲学认识发展的内在特殊矛盾，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加以揭示和探讨。其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引起的思想路线的分歧与对立，是古代至近代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这对矛盾的展开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的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思维能否反映存在、怎样正确认识对象世界的认识论问题。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关于本体论问题的分歧，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对立宇宙观；他们关于认识论问题的分歧，产生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先验论与经验论、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等各种不同的认识理论。而对本体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又必然涉及到世界的运动与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等问题，必然涉及到认识的能动性、认识的发展过程等问题，从而产生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这样，就构成了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线索。在实际的哲学认识发展中，这些基本线索总是呈现出多样的色彩和丰富的内容。在不同的民族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中，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哲学论争有其各具特点的表现形式。例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在欧洲中世纪主要是通过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对立表现出来，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则有不同的特点：封建社会前期阶段主要环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封建社会后期阶段主要环绕理气、心物关系问题而展开；对这

些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通过各学派之间的争鸣而进行的。又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极为突出，形而上学机械论与唯心主义辩证法曾相继占据统治地位，而在中国近代，由于古代朴素辩证法的传统、近代进化论的引入、康德以后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形而上学机械论没有得到典型的发展，辩证法思想却相当流行，不仅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建构的唯心辩证法体系，而且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动。

因此，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应当通过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考察，揭示历史上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根据与历史特点；依据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把握复杂纷繁的哲学现象中的内在逻辑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是哲学史研究科学化必须贯彻的方法论原则。

本书力图在论述中贯彻上述方法论思想。我们按一般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以春秋战国时期为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确立时期，明清之际为封建制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唐末农民战争为标志，划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中国哲学史，依其内在逻辑，可大致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古代哲学思维的萌芽、产生，中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哲学矛盾的展开，到荀况对先秦各家哲学思想的批判总结。第二阶段，从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问题，中经汉代神学与反神学、魏晋玄学与反玄学、东

晋南北朝隋唐佛学与反佛无神论诸思潮的起伏激荡，到柳宗元、刘禹锡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批判总结。第三阶段，从北宋初期周敦颐开启宋明道学，中经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展开与反道学思潮的批判，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王夫之对古代哲学的总结与终结。第四阶段，从龚自珍、魏源倡导“变法”、“更古”，开启近代哲学，中经中西文化的碰撞、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到融贯中西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根据中国哲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内在逻辑，本书将中国哲学史具体分为六个段落，分篇论说，尽可能简明而系统地阐明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当然，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with 逻辑结构只是相对的。随着当代哲学发展，人们将进一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揭示哲学自身的特殊矛盾，运用各种新方法，建立各种新体系，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富有新意的探讨。

哲学思维是文化模式深层结构的重要内容，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个大的典型文化类型中，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了解中国文化中哲学思维的历史，具有多方面、多层的意义。

第一，学习中国哲学史，总结并吸取中国哲学认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能力的锻炼与提高，“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

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

第二，学习中国哲学史，揭示并总结中国哲学认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可以进一步理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人类哲学发展中不同于欧洲哲学、印度哲学的另一典型。认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深化对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的认识，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认识成果的概括；认识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可以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更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哲学历史进程的一环。只有站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汇点上，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作出认真的历史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并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伟大时代课题，才能把当代中国哲学推向兴旺繁荣的未来。）

第三，学习中国哲学史，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中华民族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与消极因素，正确处理文化问题上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一方面，应当通过学习，吸取历史上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辛勤劳动的理论果实，是我们先人在漫长岁月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总结，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的精华。吸取这些思想成果，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改造，能对现代人类思维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华民族数千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

来发展起来的辩证思维传统,在今天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科学发展到今天,日益要求人类用整体观念、系统观念、有机联系与动态平衡的观念认识和把握世界。不论是探索宇观世界、考察宏观世界,还是研究微观世界,都需要科学的辩证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现代西方科学家希望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传统中吸取智慧,著名的量子论物理学家波尔(Niels Bohr)、杰出的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都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颇感兴趣,予以肯定。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却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自觉地珍惜、吸取、改造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融合到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中。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学习,克服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上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例如,中华民族虽有辩证思维的悠久传统,但形式逻辑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虽善于对自然、社会作辩证的说明,但又往往缺乏精确的分析,流于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从而严重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实现现代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自觉地克服传统哲学的消极影响。上述两个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

第四,学习中国哲学史,可以使 we 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地探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早在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就提出来了，可以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所探讨的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从未间断，这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历程却又如此艰难，充满曲折，历尽坎坷。环绕这一问题，近百年来许多思想家、哲学家上下求索，多方思考，出现了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产生了各种社会变革思潮和哲学体系。总结这一思想进程的经验教训，更深刻地反思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对今天探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富有极大的启发性。

总之，学习中国哲学史，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认真地思考中国哲学与昨天、今天、明天。在这方面，本书希望能为初学者起些引路入门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目的。